

30.1

郑心伶
梁惠玲 著

難·雕·的·塑·像

暨南大学出版社

难雕的塑像

郑心伶 著
梁惠玲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 广州

粤新登字 13 号

难雕的塑像

郑心伶 著
梁惠玲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水电学校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5 万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7-81029-347-8

1·59 定价：6.00 元

目 录

鲁迅研究：我们珍重在未来（代序）	
..... 李育中	（1）
关于海内外鲁迅研究异同的思考	（7）
“鲁迅学”的发展趋势	（25）
鲁迅文化传统及其远播	（43）
孔子、鲁迅：中国“灵魂文化”的代表	（62）
香港的鲁迅祭	（69）
美国鲁迅研究概述	（91）
美国鲁迅研究与国际文化交流	（131）
论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	（153）
困惑与崛起——鲁迅研究忧思录	（168）
从《孤独者》看鲁迅小说创作的现代文化品格	
.....	（175）
后记	（189）
送你一片静土——编辑手记	严奉强 （191）

鲁迅研究：我们珍重在未来

——让鲁迅作品到海外去

李育中

我明白世界时刻在变，但未有象近两三年变得那么厉害。由于神经有点衰弱，难免会闻变惊心，多少有点杞人忧天了。

不久之前，闻说好好的高尔基城，招牌却除落下来了，回复它的老名号——尼日尼·诺夫哥诺德，意译便是“下新城”。

我读过许多高尔基传记，也熟读高尔基自己写的自传小说三部曲，那个下新城，我记得很清楚。如今的俄罗斯人文学口味大概也在变了，好象下新城要比高尔基重要得多。走得较前的是列宁格勒，已变回圣彼得堡了。世事如棋，不堪设想。

但我浮想连翩，难免设想一下“中国的高尔基”命运又将如何呢？好在我们没有鲁迅城，绝不会发生类似的恶梦。然而早晚时价不同，人世浮沉，声名的升降也是一种常态。鲁迅自己曾预言过他的针砭时弊的文章，与时弊一起消失，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不是早有人说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

在大陆，近年的鲁迅热有些降温，并不觉得奇怪，事情能够正常化那就更好，噪音少一些，理性更高一点那是好事。不要为鲁迅命运过多担心，鲁迅是会随潮流而共进的，好在

鲁迅有他坚定的读者。对年轻人宣传与普及鲁迅，也是应该做的。当然乐观比悲观好，积极比消极好；无所谓危机论，鲁迅研究是大有前途的，真正的鲁迅研究只在起步，我主张放眼到海外，真是海阔天空。

郑、梁两位热心的研究者，情绪很高，下的工夫不少，如今能欣见把文章集合起来，实在很有助于对资讯和钻研的了解。乘此机会我提点意见和贡献些材料。

本书铺的面颇广，特别是涉及海外方面，有关美国的鲁迅研究情况，以前很少道及。其中多少也涉及到西欧，我认为该篇材料颇为充实，值得细读。对比之下，香港一篇则贫乏多了，只是报章消息的流水帐，专书与杂志论文却未道及，至少也应该突出一位成绩不少的鲁研专家张向天。

至感遗憾的，未有能及台湾方面，事实上台湾已变化很大了，它已从禁书禁读到完全解禁了，现在势头很好。我现举一本《中国论坛》为例，1991年10月它出有专辑，叫作“鲁迅定位的新起点”，并且以鲁迅像作为封面，做得很庄重。据“编辑室手记”说：鲁迅是“五四”时代最具批判力的小说家，他的《阿Q正传》塑造出的典型，几乎已是人所共晓的虚构人物，如果说不知道鲁迅，就等于自动缺席于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熟悉，应该一点也不算夸张。”

编者只把鲁迅称作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小说巨臂，多少感到不够全面，但能够突出鲁迅生前的尖锐批判精神，要点倒能抓住的。

如今鲁迅在台湾已不再是文学史上的“盲点”了，想再冷冻和掩盖他已不可能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曾指出过：大陆只肯定一个作家政治上的崇高定位，却让鲁迅研究只见正

面的铺陈，失去对其内心世界的挖掘。海岸两边处境不同，鲁迅之被误解或歪曲的命运则毫无差别云云。

该编辑的意向是邀约两岸评论家一同思索研究鲁迅的新方法、新观点，目的是还原这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以期使“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这个专辑一共有 6 篇论文，执笔的海岸两面都有。先是台湾政大副研究员周玉山的《鲁迅的文路与心路》，主要从阿 Q 谈起，说是刻划出中华民族传承有序的悲哀。还说多帧鲁迅照片中看到表情多显严肃、忧虑甚至苦恼，不似胡适那样，总是笑意盎然。作者因之便说，鲁迅不快乐的根源，恐在心路为文学的使命感填满；他反对林语堂的幽默文学，坚称中国缺乏此种土壤。又说鲁迅是主张文艺功能说的，1903 年便有了，欲借小说改良思想。又说鲁迅早期是倾向唯心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心路方面还说鲁迅对“五四”运动初时很冷淡，隔一年写信给宋崇义，仍指“五四”于中国并无影响，那是判断不准了云云。尽管与现实政治有距离，但在新文学运动上鲁迅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号召推翻人肉筵席，寄希望于青年。

又说鲁迅写作多取材自病态社会的不幸者，旨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且为之呼号请命，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应，汇成中国新文学史的主流。作者这样说是对头的。

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终于改口说道：“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的，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这种肯定多数的言论，中共史家指为唯物历史主义思想的萌芽，却标志他小说时代的结束（此处作者对鲁迅之聪明人与愚人有误解）

最后谈到“左联”成立前被革命文学派围剿，又与梁实

秋论战而左右开弓。“左联”成立后，他猛攻民族文学派，又批评胡秋原和林语堂。“左联”内部的论争，无役不与，从未公开示人以弱。强者鲁迅此时生产大量的杂文，斗争价值与文学价值的确费人思量。

跟着还说：“个性即命运”，鲁迅晚年饱受共产青年的纠缠，其中不乏意气之争，也涉及创作自由的眷恋与设限。内心百味杂陈，在私函里表露无遗，有既哀且怒的倾诉。

以上对鲁迅的理解并不深入亦无新意，同时还有不少误解与政治噪音，想来在那样的环境长期薰染下是势难幸免的，这只能是一篇初步的低水平的研究文章而已，但总有其当前时代代表性，可取只在于这一点。寄望今后少些偏见，多些有益的发掘。

下边还有北师大教授王景山所写的《鲁迅和台湾新文学》，主要谈鲁迅与张我军的关系，并延伸到杨逵与杨华两个台湾青年作家，以及台湾新文学的开山、奠基人赖和之被誉为“台湾的鲁迅”。最后还谈及陈映真、黄春明、王拓同样受过鲁迅的影响。又如施叔青、白先勇，到美国留学时才接触到鲁迅作品，都自认有过影响。至于杂文家柏杨则更不在话下了。

第三篇是北京鲁博任职的孙郁写的《新思潮影响下的鲁迅研究》主要报导1981年后的大陆鲁迅研究局面，所谓新思潮是指系统论、神话人类学以及结构主义的新方法等等，是情况介绍性质。

第四篇是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马森写的《鲁迅的小说是启蒙的文学》，主要谈自己早年爱看鲁迅的书，他认为鲁迅小说的叙述，不论第三或第一人称，总有一个“我”在。他认

为鲁迅小说的吸引力，就靠其中有一个正直的，热心的，冷静的，目光如炬的，嫉恶如仇的，仗义执言的“我”。因之其小说便有启蒙的作用，在自己生长过程中，可以说是从鲁迅那里学到了什么叫屈辱，什么叫正义，什么叫爱国。同时也使自己感到中国病入膏肓的紧迫情况，现在经历多次事变，益发觉得鲁迅言之不诬和他的敏锐的远见。

作者还说当时也读过茅盾和巴金的小说，但都没有鲁迅小说得来的印象那么深刻。全篇说来并不是什么研究，只不过自己有过的读后感而已。文章平平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

然后有一篇许悔之的《谁怕鲁迅》，说的是1982年买到鲁迅的四本禁书，其中三本小说和一本《野草》，作者对台湾现实是不满的，台湾政府现在可以不怕鲁迅，不怕“左派”作家。鲁迅当然可以被允许流通，被消费。但是鲁迅随时可能复活。那个鲁迅当然不叫鲁迅，他（她）可以是另外一个名字。

最后，他还说：唯其在政治的“超越”和“独立”，所以尽管各种政治力量在他的名字四周，或歌颂或咒骂，都无损于他名字的存在（我们可以说，鲁迅还会“活”很久）。

最后一篇便是卢嘉佑的《鲁迅全集的版本及其他》。一共介绍1938年、1958年、1981年大陆所出的三个全集版本。这样来结束这个特辑，计已占去大16开的32个页码。

海外的鲁迅研究，目前有三个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近的是港、台，远的是美国，他们有不少文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的特点，一般是政治弱化些、条条框框少，敢于自由讲话，有时有些启示，有些新方法，学术钻研或有深度，但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虽说超脱政治，其实政治成见不少，自

然会流露。所谓文学归文学，他们只会重视小说不及其余，尤其不及杂文，这是大有所失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股新鲜空气，这样一个窗口，对我们很有用。

鲁迅作品能够到海外，鲁迅的天地便开阔了。怎么说都可以，这终究是大好事，我们珍重的是眺望未来。

我临末想说，中国有鲁迅这样一个作家，永远感觉到骄傲。研究鲁迅，为鲁迅说话是值得的。

——1994年3月于华南师大两房书舍

关于海内外鲁迅研究异同的思考

作为学术研究，海内外存有种种鲁迅观，各家研究的目的、动机、立场、方法、角度、结论，有所异也有所同；存同求异，或存异求同，这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但世界何等复杂，社会颇为混沌，人生也是多色彩的，所以，对于如此严肃的课题，万勿搞成单一化与直线性，既要实事求“是”，也不可避免要讲一点实事求“非”。

所谓求“是”或求“非”，都属于一种推理判断的结果，其基础与前提均在“实事”这一基本点上。稍有偏离，就难得正确的结论，更难说有真正的科学——尤其关于探讨人生价值的科学。这份“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们鲁迅研究的“沉思录”，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当作《难雕的塑像——海内外鲁迅研究异同论》一书“卷首语”或“小引”还可以吧。

（一）“鲁迅学”的 ABC

一部长篇鲁迅研究史表明：鲁迅平凡而伟大，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存在价值。鲁迅可供研究，但不容歪曲，也不能肆意“利用”。

鲁迅，永远是活生生的社会个体——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虽然离开人间已超过半个世纪，但他以不朽业绩创立的历史地位与存在价值是不可抹煞的。毋庸置疑，只要地球还转，人类仍存，中华民族不亡，炎黄子孙的“民族魂”——鲁迅，就始终活在人们心中，其精神不会死，其成就与贡献是无法泯灭的。尽管人类社会难以预测会发生什么突变、巨变，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明后天将出现怎么样的光景，鲁迅犹如亚里士多德、但丁、哥白尼、孔子、秦始皇一样，中国史以及世界史是不会将其除名的，只是在五花八门的评价方面，常有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罢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谁也左右不了，奈何不得。即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未尝不可。不过作为历史人物，后人研究前人，是有必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就叫做研究的科学性。随心所欲的所谓“研究”，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谈不上弄清鲁迅的真面目，于社会更无益。

鲁迅研究与鲁迅的创作活动几乎是同步的。倘从1913年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算起，中国的鲁迅研究至今已有70多年，国外的鲁迅研究也有半个世纪以上了。这些研究（当然有一部分是沾不上边的，谈不上研究，说说而已，骂骂罢了）的成果，一汇总起来，虽说不是汗牛充栋，但其规模，也已经相当可观了。难怪张梦阳等编的巨型多卷本《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甬说在中国学术史、出版史，就是在全世界的文化事业，也属屈指可数之列。再说，国内的鲁迅研究史研究，也已有多人在潜心致力。光是袁良骏的一部《鲁迅研究史》也已有洋洋数十万言，再把朱文华、易竹贤、张梦阳、陈金淦等个人及有关鲁迅研究单位的一系列专著：《鲁迅研究史稿》、

《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建国后鲁迅思想研究述评》、《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鲁迅杂文研究六十年》、《四十年代初上海的鲁迅研究概述》、《上海孤岛时期的鲁迅研究》、《〈野草〉研究五十年》、《〈阿Q正传〉研究史稿》、《六十年来鲁迅杂文研究的症结》，以及再把诸如海外、港台鲁迅研究述评等加起来，便可盈尺有余了。这就是可贵的鲁迅研究之研究，要发展“鲁迅学”，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军。

“鲁迅学”从它的形成到如今，能牢牢屹立于国学之林，在世界文化史上灼灼生辉，决非某一人某一党所硬树起来的。郑学稼的《鲁迅正传》、苏雪林的《我论鲁迅》与刘心皇的《鲁迅这个人》，均称鲁迅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捧起来的，甚至声称“鲁迅有被清算的可能”。此论不难批驳，也不忙批驳。因为，谁都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倘专靠客观人为的摆布扭捏而存在，则是十分可悲的，有些可能就是毫无意义的庸辈俗物。事实上，鲁迅毕其一生，连同他身后千世万代，并不因为有人咒骂、诽谤、攻击、歪曲、贬损而伤其筋骨，暗淡无光。也决不因为有人“大树特树”而发迹起家，从此不可一世。恰恰相反，越有争论，越是挨骂，越见其“真金不怕火”。英雄本色在斗争中毕现。至于所谓“神化”，说穿了，其本身，其结果，就是一种更地道的丑化。人一旦变成神，连作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人的价值”可言。鲁迅的客观存在，不由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主宰。凡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总有其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在。你纵然对其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或企图“利用”之，以达到某一种不大光彩的目的，亦会枉然。到头来，吃亏的反而是自己。何苦来着。远的且不说，中国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历史，发生过

那么大的政治动荡，有一些大人物，妄图借鲁迅来整人、打人，为推行其错误路线效劳，即所谓“利用”（并非一般的功利主义）。但“猖獗”或“得势”一时之后又怎么样呢？还有一些是今天尚不必说清亦无法说清的问题，但时间一到也终会真相大白。不过，这都是存心“利用”者应得的“报应”，于鲁迅本人无关，不能把帐算到一个早已作古了的历史人物身上。当然，被“利用”之后，在社会上留下的阴影或污迹，譬如在青年中造成的逆反心理是严重的。这也就是鲁迅生前所预言的，名人生前死后被利用以沽名钓誉的历史悲剧。倘若鲁迅有知，他最痛苦最愤懑的一件事，正是充当了这悲剧的主角。

学术研究是非常高深而又非常严肃的人类社会科学大工程，容不得半点轻率与虚假。对于鲁迅研究这一门学科，更有其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相交融相撞击的特殊性、复杂性。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宣传鲁迅，系鲁迅本身的伟大所决定，也是时代的需要，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某一政党某一阶级的政治目的使然。至于鲁迅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要联系实际，等等，正是题中之义，不可厚非，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抽象的肯定与否定，都无济于事。鲁迅研究没有国界，却不能超越学界。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倘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研究”鲁迅，或过多干预鲁迅研究，制造困惑，那就可悲了，鲁迅及鲁研的“华盖运”也会终无了日。

这是开宗明义。意谓要首先弄清“鲁迅学”ABC。否则，难于进一步探讨许多具体的问题。

（二）争论是正常的

世界复杂多变，海内外鲁迅研究之异同在所难免，有争论是正常的。研究鲁迅、宣传鲁迅，万勿搞专制主义，也不可用“阿 Q 主义”对待鲁迅。

人就是那么奇怪，又那么有本事，主体意识相当强烈，任何东西（包括各种人与事）一进到人脑加工厂，就会创造千姿百态的玩艺儿来，我有时看你美如玉，你有时也可能把我看作比蚊蝇蛇蝎还丑恶。本来，美丑是客观存在，但由于世界观不同，志趣不一样，个人的感情色彩还是相当浓重的，谁也没办法、甚至毫无权利去横加干涉。其实，这是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只能顺其自然争下去就是了，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也着实没有匆忙或强制“统一”的必要。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习惯于搞思想“大一统”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那是封建集权的余毒，要不得。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在地球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人”这个整体概念的理解是差异甚大的。有的说中国人聪明、善良，有的说中国人愚蠢、丑陋，连自己看自己人也有各自的讲法。“瞎子摸象”这则寓言，颇有普遍意义。其实，在现当代的社会上，对中国人的灵魂透视，恐怕谁也没有超过鲁迅。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哪能比得上《阿 Q 正传》所写的尖锐、刻薄、深刻？前者只触其皮毛而已，后者才真正是“灵和肉”的解剖，即活灵活现的精神心魂的刻划。难怪有人斩钉截铁地宣称：要了解中国，就得读鲁迅。事实如此，并非有半点耸人听闻的意

味。

鲁迅，作为中国人的代表，人们对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然在所难免。同是中国人，海峡两岸、罗湖桥两头的女士先生们对鲁迅就有五花八门的看法，甚至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一亿大陆人，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也有很大分歧。就说鲁迅这一家子，三兄弟走的是两条路。鲁迅与周作人，从相亲到相悖，个中怨怨艾艾、酸酸楚楚，尽人皆知。这里，我们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自己同自己过意不去，甚至新我时时否定旧我，亲人常会变成仇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都是十分正常的事。

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打着“研究”“宣传”之幌子，向鲁迅泼脏水，涂烂泥。这也许是他们的癖好，或称“本性难改”吧。当然，这里也有轻重之分，有意与无意之别。且看那个自称“反鲁半辈子”的苏雪林，从捧鲁迅到骂鲁迅，随心所欲，样样都干得离谱、出格，叫人费解，甚至被怀疑为神经失常。不过，这也是她的“自由”。有什么办法？能追究她的责任？抑或剥夺她的发言权？都不行。也无必要。其实，偌大世界，象她这类人，为数不多。而且捧与骂只是一纸之隔，捧之过头，叫人肉麻、恶心，与骂何异？骂得失当，反而让人同情、支持挨骂者。文坛上出现苏雪林这样的人物，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了她，或许更“热闹”些。起码是，不显得那么单调乏味。如果人类世界都那么正儿八经，同唱一个调，表面上干净、安静，实际上死寂得可怕。“悲莫大于无声”，学术界倘若长期如此，那就更难堪更无聊了。前阶段，在中国大陆曾泛起贬损鲁迅的一股小阵风，又能造成什么大灾难呢？鲁迅这棵大树真的那么弱不禁风？从深一层意思说，

道理明摆着：在大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中，鲁迅这面旗子更多是在骂声中撑起来的。有多大本事的人都垄断不了太阳，一只手可以捂住自己的眼睛，但遮不住整个天体星河的光辉。担心鲁迅会被骂倒，就象害怕太阳敌不住乌云一样幼稚可笑。既然谁都有论争的权利与能耐，他骂他的娘，你念你的经，我唱我的歌，或许真能谱出一首“变奏曲”来。

都说百花园好，好就好在有百花争艳斗丽。况且，有花也有草，甚至引来不少蜂蝶与鸟虫，花草中有香的也有臭的，有毒的也会有无毒的。养花除草是要做的，但关于生态平衡的道理，还有谁不晓得半丁点儿？在茫茫大千世界中为人者，更要机灵、聪慧、勇敢、顽强，否则，势必自我毁灭或自然淘汰，竞争是绝对的。“适者生存”的学说，最好不要粗暴地否定掉，某些“奇谈怪论”，或许难听，但乌鸦自有乌鸦的才能与用场，也不必轻易地一竹竿打死它。世上一切事物，能否生存，并为世人所承认，需要历史与实践来裁决，这才是最公平的。

如上所说，鲁迅一走上文坛，便见研究蠡起，乃至后来“鲁迅学”的建立发展，都先由他本人的因素（关键在成就）所决定。但经过时间老人的洗礼，正反意见的交锋，益见其光芒，也必须充分看到。而这些，恰恰就是“鲁迅学”得以深入发展，方兴未艾的根本原因。

一个物象（包括死了或活着的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适得其反的事是常见的。中国人看不准自家的鲁迅也不足为奇。早在二三十年代，鲁迅既有反封建的“精神界之战士”、“新文学主帅”、“一代宗师”之赞誉，也曾被骂为“双重反革命”、“封